

# 乡村新内生发展何以提升治理效能?

## ——基于关中G村的调查

李博, 张家阳, 郭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和陕西省G村的治村实践, 构建“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分析框架, 通过对乡村新内生发展路径的总结与提炼, 探究新内生发展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逻辑。研究发现, 在国家资源与村民利益实现供需对接的前提下, 乡村外生发展受到注意力竞争与外部关系网络的影响, 村内关系网络中的特定节点在实现本土资源有效整合中发挥关键作用。乡村内外生发展以及集体经济的壮大, 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机制包括找回村民主体性, 激发村内治理活力; 强化社会认同, 形塑乡村秩序; 重构乡村关系网络, 培育村民公共精神。

**关键词:** 新内生发展; 资源转化; 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4)05-0088-08

## How can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nhance

###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 —Based on a survey of village G in Guanzhong region

LI Bo, ZHANG Jiayang, GUO 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arxist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in village G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upply and demand docking-resource transformation-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governance and the logic behind it by summarizing and refining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docking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villagers' interests, rural exogenous development is affected by attention competi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and specific nodes in the village relationship network play a key role in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nd the growth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village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village efficiency includes regaining the villagers' subjectivity,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village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social identity and shaping rural order,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cultivating villagers' public spirit.

**Keywords:**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versi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rural revitalization

## 一、问题的提出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六年强调“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对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至关重要。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有序推进, 乡村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受

收稿日期: 2024-04-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SH080);  
202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4XJC710005)

作者简介: 李博(1987—),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为通信作者。

到了充分重视。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项目下乡所导致的资源依赖<sup>[1]</sup>、资源稀缺型村庄内部利益关联弱化<sup>[2]</sup>等问题在乡村社会中逐渐显现。仅依靠国家资源输入或是乡村内部力量难以有效应对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如何有效联动乡村内外部动力,整合并发挥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势,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已成为当前亟须深入探讨的关键议题。

从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关联成果来看,学界主要从价值取向和实践进路两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方面是强调乡村新内生发展的价值理念。有学者通过反思西方语境中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现实基础、意识形态底色以及理论限度<sup>[3]</sup>,从时代内涵的角度论证乡村新内生发展与当下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sup>[4]</sup>的契合关系。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要重新挖掘新内生发展模式的价值意蕴,将“社区为本”和“能力本位”两种价值取向结合<sup>[5]</sup>,以更好地发挥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支撑作用。还有学者从空间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区域发展价值,立足中国农村的差异性,建构不同类型的发展网络<sup>[6]</sup>,以提升不同类型农村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探索新内生发展的实践路径,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sup>[7]</sup>、乡村特色产业<sup>[8]</sup>等研究领域,回答了外部资源应当如何撬动内部资源,进而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sup>[9]</sup>的问题,为乡村新内生发展带来了模式创新。

关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学者们提供了多种分析视角。第一,以治理主体为分析视角。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之一,发挥其在道德教化和协调方面的积极作用<sup>[10]</sup>,在协商中促进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对提高乡村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sup>[11]</sup>。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新乡贤群体能够以利益共建促成利益相关,激活村民群体的公共精神<sup>[12]</sup>,进而推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第二,以治理工具为分析视角。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打破传统城乡分化状态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的治理工具<sup>[13]</sup>,需要促进乡村空间的数据共建以筑牢数字治理的基础,强化数字技术的乡土适配以赋能数字价值<sup>[14]</sup>,实现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第三,以治理关系为分析视角。有学者立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域,提出乡村“治理有效”应表现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充分投入与村民充分自治之间的契合性关系<sup>[15]</sup>。基

于“政党-社会”的互动关系,学界提出了“党与社会链接”<sup>[16]</sup>、“政党引领社会”<sup>[17]</sup>、“政党-国家-社会”<sup>[18]</sup>等解释框架,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总体而言,学界在乡村发展如何实现内外联动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目前尚不清楚新内生发展视角下实现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逻辑和机制。现有研究大多将新内生发展理解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实践层面的研究仍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将结合新内生发展理论,从 G 村案例出发,对新内生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其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和阐释。

2022—2023 年,笔者研究团队多次到陕西省关中地区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对比多个村庄,发现 G 村通过充分统筹调配村庄内外部资源,既能挖掘本地资源以激发内生动力,又能联动外部资源助力村庄发展,最终提升乡村的治理效能。在 G 村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乡村遵循的新内生发展路径是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将结合关中 G 村的治理实践,通过建构“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分析框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 二、理论与分析框架

### (一) 新内生发展理论

关于农村社会发展取向的研究,学界存在“外源”发展与“内生”发展的理论之争。外源发展也被称为外生发展,在二战时期引起广泛关注。当时欧洲国家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处于加速阶段,人们普遍认为乡村应当向作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城市靠拢,同时政府鼓励乡村劳动力和资本外流<sup>[19]</sup>。其后,内生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新思潮应运而生,其在批判具有逐利特征的外生发展模式掠夺乡村资源、阻碍地方自主发展权限<sup>[4]</sup>的同时,认为乡村发展应依赖内部力量和本地资源,强调农村发展中主导与支配位置的转换以及农民、农村作为发展主体的回归。但对于既有社会资源缺乏的农村而言,内生发展模式的效果并不佳<sup>[3]</sup>。进入 21 世纪,Christopher Ray 对外生式发展模式和内生式发展模式(传统)进行整合与创新<sup>[20]</sup>,首次提出“新内生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概念。新内生发展模式不再追求传统内生发展模式“自下而

上”的单一路径<sup>[5]</sup>,而是以资源、参与、认同为核心要素<sup>[21]</sup>,以内生潜力、发展社会资本和促进地方参与作为三大支柱,融合内部系统和外部网络,激发当地的发展潜力<sup>[22]</sup>,从而在“上下联动”和“内外共生”的混合路径中谋求乡村的整体性发展<sup>[5]</sup>,最终提高乡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新内生发展最早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将其进行本土化的理论阐释,能够为农村新内生发展的中国道路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sup>[3]</sup>。

## (二) “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框架

新内生发展不是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发展权力的争夺或此消彼长的接替,而是国家权力在作用机制上的优化和转型<sup>[3]</sup>。在实践过程中既要考虑国家权力如何嵌入基层社会,又要确保国家话语向基层“最后一公里”传递的有效性,这就需要国家供给与地方需求之间形成良好对接。具体而言,国家作为乡村发展的供给者,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给予乡村社会支持。与之相对应,农村基层以村民实际需求为基础,对资源进行精准识别,实现与国家层面的良性互动,提高后续资源的配置与整合效率。而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社集体)既能最大限度地向农民反映国家意志,又能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将群众力量融入承接国家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为国家自上而下地推进乡村治理提供组织化平台。

在实现供需对接的基础上,村社集体通过调配与聚合村庄内外资源,推进乡村新内生发展的有效实践。新内生发展思想强调将内外两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即利用自身资源获取外部资源,为本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sup>[22]</sup>。在关系网络的影响下,内部资源被重新挖掘和整合,并与乡村社会外部的各类资源链接。在此过程中,党组织引领的村社集体发挥“统”的功能,将本土人才、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组织起来,激活和赋能各类乡村治理资源,促进各类资源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和乡村发展优势。

以整体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乡村新内生发展,追求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内外资源转化为能够促进村庄经济发展、产业振兴的发展成果,进而撬动村内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村民主体性、乡村治理秩序以及公共精神等方面实现善治。在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成果再到村内治理效能提升的过程中,村庄遵循内外联动的新内生发展路径,实现

外部力量的有效对接和内部效能的挖掘激发。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实现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的“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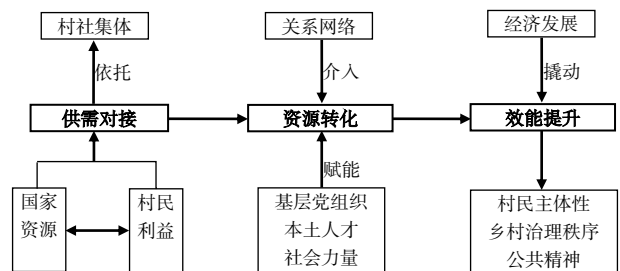


图1 “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框架

## 三、案例选取与呈现

### (一) 案例选取

本研究选择陕西省关中地区G村的治理实践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G村的治村实践具有典型性。G村原是传统的农业型村庄,几年前与当地其他村庄一样,既面临村集体经济增收的结构性困境,又缺乏资金、人才、技术等。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G村在村级班子建设、集体经济发展、工作实绩、乡风文明等方面均位于关中地区前列,成为乡村振兴典型引领村。另一方面,本研究所选案例与前文所预设的理论情景较为契合。G村的发展路径遵循新内生发展的范式,通过推动乡村发展需求与村庄内外资源供给相匹配,促进资源向经济效益和治理能力转变,最终实现“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的新内生发展。

2022—2023年,笔者研究团队多次前往G村及其所在区、乡镇政府,对村干部、农户、乡镇干部和所在区政府工作人员等人进行访谈,深入了解G村在党建引领、集体经济、村务处理等方面的治理实践和成效。从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报告中收集与案例相关的二手资料,并以电话回访形式再次访谈受访对象,遵循三角验证原则,对案例样本进行对比、验证和补充。

### (二) 案例介绍: G村的治理实践

G村地处黄土台塬区,土地资源较为匮乏。2019年以前,村“两委”班子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心无力,G村曾被冠名为“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是全镇的后进村。

1. 突破发展桎梏: 扭转村庄失序境况(2019—2020年)

2019年,在外经商办企业的ZLQ返乡后被任

命为 G 村的党支部书记。ZLQ 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党组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为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ZLQ 要求每个村干部每年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提出奋斗目标并做出承诺,并将承诺书张贴于办公室和村内服务中心,接受全体村民监督。此外,ZLQ 也重视各项村务工作:重新启用日常村务公开栏和政策公布栏,使村庄事务更加公开、透明,保障村民的知情权;村内重大事项的决策严格遵循“四议两公开”的工作程序,设立村民议事厅广纳民言、广聚民意,让村民参与村务决策,以话家常的方式为村民办实事、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 2. 明确发展规划:唤醒内外沉睡资源(2020—2023 年)

G 村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整合利用村庄内外资源。为响应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号召,G 村于 2020 年 3 月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该合作社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变废为宝”,将村中无人耕种的 100 亩废弃地复垦成良田,为村集体创收 7 万元,盘活了村内的土地资源。G 村还利用废弃池塘种荷花,建设栈道、湖心亭、民俗园等休闲设施,供村民观赏游玩。

2021 年,G 村制定了当地首个村级乡村振兴发展五年规划,明确提出了“一社两园三阵地”的五年发展目标<sup>[23]</sup>。依靠政府提供的项目资金,G 村建成了产业化蔬菜大棚园和立体生态产业园,为村集体实现增收近 50 万元。2022 年 11 月,G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苏陕协议为契机,与 J 公司达成合作,共同推进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2023 年底,G 村“喜蛋牌”果蔬展厅揭牌成立,搭建了外界了解 G 村特色农产品的平台,这对延长农业产业链、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意义非凡。目前,G 村集体经济的年产值达 380 万元,带动 180 余人就近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2000 元。

## 3. 治理效果显著:稳固乡村治理基石(2023 年至今)

近年来,G 村实现了集体经济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逐渐壮大的村集体经济在帮助村民增收致富、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还成了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支撑。G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每年的收益主要用于村级组织运转、村内公共事务、村民分红以及村集体产业周转,其中村内事务包括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以及依托文化大舞台开展各类主题文化活动等。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例,G

村集中各方资源,先后实施了饮水管网改造、滑坡治理、整村亮化等工程,建设补植花带 4.7 千米,建设国策门配套花海 1 片,改厕 350 个,将 1300 平方米的广场扩建成集体休闲娱乐和运动为一体的 5000 平方米的功能性广场。短短几年,G 村成为全区第一批乡村振兴典型引领村、陕西省村庄清洁行动先进村,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带来经济效益的基础上,G 村的可持续发展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内源性支柱,村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实现双丰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逐渐向好的发展基础与较为完备的村级配套设施,为 G 村争取到了后续各种项目资金的优先分配权。

## 四、新内生发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

### (一) 供需对接:国家资源供给与村民利益的对接

村庄要想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应积极探索国家资源供给与村民利益需求的有效对接,这也是村庄实现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国家资源在输入基层“最后一公里”的过程中,遵循以村民利益为本位的底层逻辑,最大限度地回应村民分散且多样化的需求。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供需对接的平台,为国家自上而下地推进村域治理行动夯实了组织化基础。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内嵌于乡村社会的村级组织,能够汇集广大村民的诉求、反映广大村民的共同利益,因而其在对接国家政策和项目资源时,能够帮助村民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同时将村民意愿融入项目的实施进程中,使得国家资源完成实质性的落地。

首先,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为村民群体提供利益表达的空间或渠道,解决国家与村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G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下设的议事厅成为了解村民需求、解决群众矛盾、商议村庄发展规划的场所。“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反映的问题无论大小、涉及哪一方面,我们都会认真去听并记录下来,然后认真去做、去解决。”(访谈记录:20230720 村书记 ZLQ<sup>①</sup>)除了知悉村民诉求以外,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充分关注村民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建立了透明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以 G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产业取得收益的分配机制为例,收益的 30%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和公共产品与服务

的供给,剩余的70%用于农户的分红,使全体村民共享村庄发展成果。

其次,处于“中间位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了解政府的工作原则,熟知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能够通过和村民的积极协商,将基层政府指派的“行政性事务”转化为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村庄的公事”,使之更为顺利地进入乡村社会并为村民所接受。此外,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村内多方的利益诉求汇聚起来,完成分散的个体需求向公共的集体需求的转化,再结合政府向下传达的国家意志做出判断和决策,例如产业的选择、项目的规划等,都是凝聚多方共识、对接国家意志的结果。由此,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村民利益需求实现有效对接。

基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基层重要的组织,构建了国家和小农群体之间的制度化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难以与庞大而又分散的小农群体进行有效对接的问题。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发挥“中间人”的作用,将村民的需求向上反映和传达,同时推动国家资源顺利进入村庄以满足村民群体的需求,减少公共资源的损耗,以确保资源供给的有效性<sup>[24]</sup>。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建立利益衔接机制将村民组织起来,介入承接国家资源的过程中,一方面这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方式能够让村集体与村民实现利益共享,多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也随之联结起来;另一方面使得村民能够依靠集体真正地参与村庄发展,这也凸显了村民的主体性地位。

## (二) 资源转化: 内外资源向经济效益的转化

资源整合是内生发展的前置条件<sup>[25]</sup>,但在各类国家资源和项目下乡的过程中,许多村庄过于依赖外部资源的输入,而忽视了村庄内部资源的盘活与重新整合。而且,村庄内生动力的激活,离不开乡村内部社会关系网络中特定节点(一般是村干部或村庄精英)的协调。在特定节点的助力下,乡村内部资源能够得到有效整合。正如G村书记在访谈中所说:“其实我们村有资源,只是以前没发现,前段时间去浙江学习了之后,才知道要科学利用自己村的资源,所以只有转变思路才有出路。”(访谈记录:20220728 村书记 ZLQ)

基层党组织立足村庄实际,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统筹和调度村内各类治理资源,从而为村庄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首先,凝聚村庄内部文化认同,挖掘内

部资源,夯实乡土社会基础。只有将民间文化与公共活动结合起来,创建村民社会关联,才能唤醒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sup>[9]</sup>。G村利用村民大舞台开办秦腔文化演唱活动,不仅挖掘了村内文化资源,吸引了周边游客,而且还让村民参与其中,无形之中,乡土纽带在村民之间得以维系。其次,对分散的农用地重新整合,进行适度规模化经营,有效贯通了村内其他资源,这也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展生产活动积累了启动资金。土地资源是村庄最为重要的一类资源,在城镇化、农村空心化之后,出现大量耕地抛荒和宅基地闲置的情况,村庄基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需要,重新整合土地资源,土地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得到提升,为后续产业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G村书记 ZLQ 是经营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在构建不同层次的外部非正式关系网络上发挥关键作用,将外部资源嵌入乡村社会,并促进其与内生力量相融合。在非均质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地方领导干部更愿意将项目资源分配到村庄发展基础较好且村“两委”干部能力较为突出的村庄<sup>[26]</sup>。此类村庄只需较低的资源成本就可在短期内获得明显回报,具有“投资少、回报大、风险低”的典型特征,而且有助于地方政府打造“亮点”、创造政绩。村书记 ZLQ 是有名的“要项目要资金的上访户”。“好多基层干部是‘等、靠、要’,我是‘争、抢、跑’。同样一个项目给你也行给我也行,我跑上了我就把项目争来了,还要抢抓先机,大家都在路上跑,我比你速度快点,所以这个项目就让我争取到了。”(访谈记录:20230720 村书记 ZLQ) ZLQ 通过自筹、招商引资等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大力整改村内人居环境,完善村内“硬件”设施,并为后续的项目争取创造了有利条件。G村在上级领导的关注和村书记 ZLQ 的努力“争资跑项”下,成功申报多个项目,并依托项目建造了蔬菜大棚、立体生态产业园,为村集体带来近380万元的年产值。

村庄的产业发展还需要同企业、科研院所等社会力量建立关系网络,争取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sup>[27]</sup>。在基层政府的协调和推动下,外部企业进入村庄产业发展系统,帮助村集体和农户个体解决在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中遇到的难题,对接村民的利益需求并使其受益。如,利用苏陕协作的契机,G村和J公司签约达成合作,依托资源禀赋打造便民富民的田园综合体项目,为村集体的产

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品牌孵化服务。另外, G 村与“中国蔬菜之乡”山东省 S 市科研院所建立联系, 聘请相关技术人员为 G 村提供技术指导, 使村集体的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产量翻番。村庄外部力量的加入, 使得 G 村能够获取到更为多元的市场信息、销售渠道以及更为专业的技术指导, 这不仅打通了农产品加工、市场营销、流通等多个环节, 而且还为 G 村村民参与村集体经济相关的各项活动提供了现实基础, 能够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凸显村民主体地位, 增强其对村集体的认同感。

### (三) 效能提升: 经济效益对治理效能的撬动

在村干部、村民等村治主体的介入下, 村集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推动村庄经济快速发展, 还能将国家资源转变为村庄内部公共资源, 将外部力量与村庄内生力量联系起来, 从而提高村庄的资源调配能力和生产服务能力, 这对于找回村民主体性、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培育村民公共精神等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1. 找回村民主体性, 激发村内治理活力

农村集体经济除了具备经济功能之外, 其发展所形成的利益关联还具有激活村庄政治, 使民主运转起来<sup>[28]</sup>的政治功能。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所带来的收益主要用于村级组织运转、村内公共事务、村民分红以及村集体产业周转等事项。“你说集体经济挣的钱用来做什么呢, 我这个支部提出来的意见是挣的钱第一个是先给村民办实事。”(访谈记录: 20220728 村书记 ZLQ) 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村集体经济收益来为村民办实事, 村集体领导班子的向心力在为民办事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增强, 为民服务、保障民生的能力得到提升, 村民也能切身体会到产权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优越性。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是领导班子和村民协商的结果, 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村民可能因其他主体的新颖想法而获得视野的开阔, 摆脱固有思想的束缚, 不断向理性思维靠近, 提高参与和表达能力。

另外, 村干部对村民入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动员以及制定利益联结方案的机制保障, 推动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中, 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在参与村集体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 村民的基本权利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例如 G 村集体产业的确定是充分与村民进行商量的结果。“选产业的时候也要‘四议两公开’, 跟支部和村民代表们开会决议, 而且要公开。”(访谈记录: 20220728 村书

记 ZLQ) 村干部利用协商议事等方式循序渐进实现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的再确认, 塑造村民权责一致的认知<sup>[29]</sup>, 不断增强村民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主动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府主导型乡村发展弱化村民主体性的风险, 成为找回村民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村集体经济为村民提供的基础性农业生产服务是一种低成本且高福利的集体内部自我服务<sup>[30]</sup>, G 村通过申请农机服务项目和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购置近 300 万元的各类农机具, 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成本补贴。“农村翻一亩地收 60 块钱, 我们只收 30 块钱的机械加油费, 还免费打药。”(访谈记录: 20230720 村书记 ZLQ) 村集体经济为村内群众提供基础性农业生产服务, 是尊重村民主体地位和增强村民集体凝聚力的体现, 减少了村民加入村集体生产活动的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村民从产业振兴的旁观者变为投身生产的参与者, 让村民回归村庄公共性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 2. 强化社会认同, 形塑乡村治理秩序

一是重塑村内公共空间。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一种具备聚合力的物理空间, 它的再建构不仅关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 而且还关乎乡村秩序能否维持平稳有序的状态。村集体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并且通过对村庄物质基础的再造, 能够实现村庄文化和价值的重塑<sup>[31]</sup>。G 村建设的栈道、湖心亭、民俗园等休闲设施以及文化大舞台、功能性广场等, 实际上是“活化”了此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的开放空间, 实现了对公共空间的重塑。这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 提升了村民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与此同时, 村民以及村内各组织在休闲娱乐场所等公共空间中的互动, 还增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 培育并增强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归属感, 实现了乡村振兴所依赖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sup>[32]</sup>。

二是提供乡村社会秩序的规制保障。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 除了重建村内公共空间, 还需要村规民约、乡村精英的非正式权威等乡村公共规则的有机嵌入。公共财力是基层共同体以及相应的伦理秩序、道德秩序运转和维系的重要基础<sup>[33]</sup>, 村集体经济为公共财力的增加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村庄经济基础稳定的前提下, 村庄更愿意将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乡风文明建设。G 村积极开展“文明家庭”“道德模范”“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 评选出



广大群众心中的“好榜样”，并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促进农村文明新风尚的形成与宣扬，推动构建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2023年，G村红白理事会将国家建构的制度规范和基层政府的治理目标内化为村民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sup>[34]</sup>，在其管理下，婚丧嫁娶中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开支平均被压缩30%左右，大大减轻了村民负担，助推乡村文明节俭之风的形成。

### 3. 重构乡村关系网络，培育村民公共精神

在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趋势下，经济力量深刻地嵌入乡村社会变迁中，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关系网络逐渐解构<sup>[35]</sup>。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半熟人社会的来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使得乡村熟人关系网络结构面临瓦解危机。村集体经济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驱使村民与关系网络中各个节点，包括乡镇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组织等产生联系，这有利于强化村民和各节点之间以及各节点之间的人际关联，从而实现良性互动与合作。G村农户以往以种地为主，多将初级农产品售卖至农贸市场，利润空间极低，而在村集体经济的带动下，农户能够通过果蔬展厅与外界企业等社会组织产生联系，让外界真正了解并熟知村内的特色农产品，有利于拓展农户自身的业缘、地缘关系，使其社会关系网络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村庄传统关系网络产生影响的同时，也改变了村民们的谋生方式。G村立体生态产业园的建设使村民们能够在“家门口”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从事此类第三产业的村民越来越多，产业融合的趋势愈加明显。

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加剧了个体原子化、疏离化趋势，村民的集体观念淡薄，乡村社会公共精神日渐式微，主要表现为个体公共责任意识淡漠和社会公共舆论监督弱化<sup>[36]</sup>。诸如G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所产生的公共利益成为全体村民的共同追求，有利于重新唤醒村民的公共意识并形成公共价值，使村民在经济上再度与村集体建立联系，对于培育公共精神、汇聚乡村发展合力具有关键作用。依托项目资金和村集体经济结余，村内的功能性广场、文化大舞台等文化类基础设施得以顺利建成，此类公共文化建设是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价值输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将国家主流文化价值内化为乡村社会的情感共同体精神<sup>[37]</sup>，从而激发村民的公共意识，对村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凝聚力具有较

强的塑造作用。

##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结合陕西省关中地区村庄的调研，借助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了以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为要素的分析框架，探析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对如何整合内外部资源以推动乡村实现治理效能提升进行了系统化的解读。

研究表明，在供需对接方面，村庄承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输入，并结合村社内部的运行规则和村民真实的利益需求表达，实现国家资源供给与村民利益需求的有效对接。在此过程中，位于供给端和需求端中间的村社集体，为国家自上而下推进村域治理行动夯实了组织基础。在资源转化方面，项目等资源向村庄的输入在外部资源嵌入村庄过程中占据主要位置，因此注意力竞争和外部关系网络的运用较为常见。在建立了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的前提下，村社集体发挥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生产服务能力，对内部资源进行盘活挖掘，并灵活开发。村党支部书记作为连接村庄内外部的关键节点，对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动力具有促进作用。在村社集体的调配动员与能人的带动引领下，内外部资源转化为促进村民增收和村庄发展的经济效益。在效能提升方面，内外部资源转化所带来的经济利润和公共利益，对于乡村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主体、秩序、价值三个方面推进了乡村的公共性建设，促进了治理效能的提升。

本研究有如下启示：第一，应充分发挥村级组织本土化的地缘优势和联络外部社会关系的重要功能，使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有机融合。吸纳各类人才返乡进入村级组织，组建能够汇集乡村内外资源并对其进行科学统筹管理的专业团队，促进资源转化为公共治理效能。第二，政府应从乡村视角出发，既要注重对村内特色产业、新型经营主体等的培育，激发乡村社会内部发展活力，又要提高资源协调能力，通过制定与创新相关的政策，引导外部力量有序进入乡村社会内部，推动构建“以内生发展为主、内生外生发展相互促进的乡村新内生发展格局”。

### 注释：

① 访谈记录编码规则：前8位数字为访谈日期（如“20230720”表示“2023年7月20日”），其后的文字则为受访者代称。

## 参考文献:

- [1] 李祖佩, 钟涨宝. 分级处理与资源依赖——项目制基层实践中矛盾调处与秩序维持[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2): 81-93, 97.
- [2] 李婷. 资源分配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差异[J]. 求索, 2023(6): 166-174.
- [3] 吴越菲. 内生还是外生: 农村社会的“发展二元论”及其破解[J]. 求索, 2022(4): 161-168.
- [4] 张行发, 徐虹, 张妍.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Y县为案例[J]. 当代经济管理, 2021(10): 31-39.
- [5] 文军, 刘雨航. 迈向新内生时代: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5): 142-149.
- [6] 吴越菲. 从部门生产到区域繁荣: 面向农村新内生发展的政策转型及其反思[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5): 158-168.
- [7] 肖盼晴, 姚玉凤.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可持续发展——以新内生式发展论为视角[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5): 555-563.
- [8] 马海龙, 杨玟玟.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阈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整合——以东北地区J村木耳产业为例[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3(4): 64-77.
- [9] 杨锦秀, 刘敏, 尚凭, 等. 如何破解乡村振兴的内外联动而内不动——基于成都市蒲江县箭塔村的实践考察[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3): 51-61.
- [10] 张陈一轩, 任宗哲. 精英回乡、体系重构与乡村振兴[J]. 人文杂志, 2021(7): 113-121.
- [11] 尹利民, 邱观林. 民主促民生: 精英引领下的基层协商民主治理实践——基于SQ村协商民主实践的案例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2): 58-64.
- [12] 彭晓旭.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践逻辑: 以广东Z村为例[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4): 25-31.
- [13] 吕普生. 数字乡村与信息赋能[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0(2): 69-79, 158-159.
- [14] 陈桂生, 岳喜优.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何以提升? ——基于数据、技术、平台的分析框架[J]. 电子政务, 2024(1): 90-101.
- [15] 黄辉祥, 刘骁. 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形态: 一种结构分析——以湖北Y村为例[J]. 江汉论坛, 2023(8): 73-78.
- [16] 吴晓林. 党如何链接社会: 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J]. 学术月刊, 2020(5): 72-86.
- [17] 田先红. 政党如何引领社会? ——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建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J]. 开放时代, 2020(2): 118-144, 8.
- [18] 潘泽泉. 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31-40.
- [19] 王兰.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以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65-74.
- [20] 张奇男, 董芹芹. 新内生发展模式下乡村体育发展: 理论溯源、价值意蕴与行动策略[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4(2): 197-203.
- [21] 张文明, 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 2018(11): 75-85.
- [22] 闫宇, 汪江华, 张玉坤. 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与拓展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7): 19-23.
- [23] 区委组织部.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争当乡村振兴的“领头雁”[EB/OL]. <http://fx.baojidj.gov.cn/info/1037/2638.htm>.
- [24] 张嘉凌, 董江爱. 国家资源输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运作逻辑分析——以山西兴县农村发展合作总社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9): 148-150.
- [25] 袁宇阳, 张文明. 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J]. 世界农业, 2020(6): 10-17.
- [26] 邢成举, 吴春来. 领导注意力、项目分配与政策投入的资源陷阱——示范村经验何以难示范[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4): 64-77, 171.
- [27] 廖晓明, 方婷, 邱俊柯. 农民合作社发展: 社会资本与合作参与——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83-93.
- [28] 向楠, 乐章.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 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3): 114-127.
- [29] 张紧跟, 张旋. 整合式赋能: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机制——以山东B县W村为例[J]. 探索, 2023(3): 76-89.
- [30] 夏冬, 夏柱智.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类型界定与治理效应[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62-71.
- [31] 叶娟丽, 曾红.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J]. 探索, 2023(2): 127-140.
- [32] 张玉强, 张雷. 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Y村的案例考察[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497-504.
- [33] 吕方, 苏海, 梅琳. 找回村落共同体: 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来自豫鲁两省的经验观察[J]. 河南社会科学, 2019(6): 113-118.
- [34] 程同顺, 杨明, 李鑫涛. 强制、互惠与乡风文明的养成机制——基于文村红白理事会的实践考察[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3(4): 88-96.
- [35] 吴青熹.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乡土伦理的重建[J]. 伦理学研究, 2021(6): 127-133.
- [36] 姜晓萍, 许丹.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 29-37.
- [37] 杨龙飞, 疏仁华. 情感与仪式互动社会下的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塑造[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4): 26-34.

责任编辑: 黄燕妮